

范晔评传 (下)

瞿林东 李 珍 著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光武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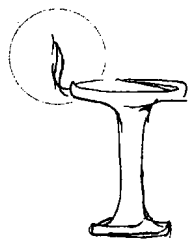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本屬零陵冷水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事具宗室四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有德祖有功而宗故稱祖祖諱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伯升次仲故南陽蔡陽人陽縣故城在今隨州棗陽西南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

定王發潭長沙郡今發生春陵節侯買春陵鄉名

陽縣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范晔评传 (下)

瞿林东 李 珍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晔评传/瞿林东,李珍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5947-6

I. 范... II. ①瞿…②李… III. 范晔(398~445)—评传
IV. B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329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范晔评传

瞿林东 李 珍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0 字数 337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947-6

定价:59.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孝萱	左 健	巩本栋	茅家琦
扈 宪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六章 政治思想:政治统治的方略及得失

中国古代史家无不关注政治统治,因而政治思想总是史学家之思想构成中的重要方面。其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时代特点的不同和认识程度的不同。

关于政治统治的论述,是范晔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范晔一方面与其他史家一样,将对政治局势的关注与分析作为史书撰述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又着意于对朝代的兴亡作深入的探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后汉书》中,政治思想所涵盖的范围很广,本书所讨论的范晔的历史、民族、伦理等方面思想,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政治思想相联系,如民族问题可以说是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问题,各朝代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实质上也是当时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的儒家“德治”理想,实际上既是一种伦理思想,



又是一种政治思想。在《后汉书》中,关于政治发展局势及朝代兴亡方面的论述,可以大略地分为关于政治统治的一般理论与关于具体的政治措施、政治事件的认识。我们讨论的重点,在于探讨这些评论中所反映出的范晔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与一般价值。

范晔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结合东汉一朝的政治形势与政治局面展开论述。如《后汉书》将后妃传入纪,是为了突出东汉多女主执政的政治特点。

二是重视社会风气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范晔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范晔对东汉一朝政治上的治乱得失,有许多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转折时期关键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起作用的估计上。但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中,他尤为关注在某一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社会风气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如他对党人势力兴起与统治者所好之间的必然联系,对儒学盛行之风于东汉历史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对“人心向化”于维护政治统治所具有的重要性等等,都有专门的论述。

三是具有“通识”。范晔关于外戚、宦官、循吏、酷吏、儒学等影响东汉政治面貌的重要问题的论述,都从前史的相关记载与史事入手,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局限,具有了贯通的眼光与识见。这既是范晔“考镜源流”的表现,同时更是他对上述现象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求正确认识的努力。

四是具有朴素的辩证色彩。如他关于宦官的历史作用,



关于酷吏的历史地位,关于党人与宦官的关系,以及关于政治统治的张弛之道的认识,无不反映着这一特点。这些认识是在继承前人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着对东汉历史的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是范曄史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理解东汉历史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历史机运与政治统治

关于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历代史家都着力探讨的根本问题。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司马迁通过对“势”的概念加以阐释,以说明历史变迁之由;其后的史书对此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一般说来,这种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路径是从天人关系中去寻找答案,另一条路径是从人与历史机运或“时”与“势”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与历史理论发展的特点,这些认识一方面都不乏朴素的唯物倾向,一方面又受时代局限,具有某种程度的天命思想。这种两重性在范曄的思想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而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关于历史发展大势的认识,虽亦有“符运”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流是继承了前代史家的积极认识并有所发展的。

本书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到范曄对“符运”之说的某种程度的认可。他在《光武帝纪》的后论中说,光武帝自出生起就有祥瑞之兆,“有赤光照室中”,当时就被认为“此兆吉不可言”。而且,“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不断有种种吉兆证明,刘氏当再兴,



也不断有方士、道士以不同的方式暗示刘秀的不同寻常。在记述了这些内容之后,范晔慨叹说:“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①在论述隗嚣史事时,范晔亦认为,“隗嚣援旗纠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势,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歿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②他认为,以隗嚣等人的才行而论,统治一方绰绰有余,只是由于没有顺应天命,且与天命相违,“天数有违”,所以虽然有江山之固可以凭借,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由此看来,范晔对于一些自己难以解释的史实,采取了一方面依照时人所说,“照实录之”的态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谨慎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并不是源于他对天命论的信奉,而是对朝代更替兴亡之故的一种迷惑与思考。从根本上看,范晔是反对讖纬之说的。他写道:“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触一切之功哉!”^③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譎无已”^④,认为方术“玄奥难原”,“纯盗虚名,无益于用”^⑤;甚至对于自己评价颇高的光武帝,他也对其“尤信讖言”的做法给予尖锐批评,“郑、贾之学,行乎数百

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公孙述列传》后论。

③ 《后汉书》卷一五《李王邓来列传》后论。

④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后论。

⑤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序及后论。



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谏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①他对桓帝也多有讽刺之辞。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对天命妄加揣测,一方面又认为“受大福者”必然是信乎人、顺乎天的,“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②把“天”与“人”结合起来,而且以“人”为先,说明了范曄思想的基本倾向。受这一倾向的影响,范曄明确认为,决定皇朝兴衰的根本是“王政”与“德教”^③。这一点成为他的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在论述民族关系发展历史时,始终贯穿了这一具有朴素辩证色彩的认识。

范曄在《后汉书》中,突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历史人物应当顺时而动,依势而行,否则便不能取得成功。他在《刘玄刘盆子列传》中说,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这说明“时有未至者也”,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尚未达到亡商的程度。至于刘邦兴起之初,其力量并不为最强者,“不当天下万分之一”,但却能做到“旌旗之所麾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人力之功,“固亦几运之会也”。这种“几运之会”,事实上指的就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如果仅凭个人之力,逆潮流而动,那

① 《后汉书》卷三六《郑范陈贾张列传》后论。

②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后论。

③ 参见《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序:“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吠夷人居郃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就只能做悲剧英雄,“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①同样,范晔对汉献帝的悲剧性命运给予了客观的分析:“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这里的“天厌汉德”,事实上反映了刘氏皇朝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客观实际。在这种情况下,仅凭汉献帝个人的品德与能力,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将东汉之亡归咎于他没有道理。

范晔在强调历史大势不可违的前提下,又对历史人物的积极作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贤者的努力可以延缓政治统治衰亡的趋势,维持其政治局面。他说桓帝时“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是东汉即将亡灭的标志。但在“五邪嗣虐,流衍四方”之时,由于有李膺等“忠贤力争,屡折奸锋”^③,才使得东汉皇朝得以继续,桓帝本人也避免了篡弑之祸。和帝时,由于皇帝年幼,窦氏外戚专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④。《后汉书》的《儒林传》则更把儒士们的历史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但由于有张温、皇甫嵩这样的贤臣存在,则其“皇统”得以延续,“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

①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刘盆子列传》后论。

②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后论。

③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后论。

④ 《后汉书》卷四三《朱乐何列传》后论。



议”^①。这说明,在范曄的认识中,历史之“机运”虽不可违,但人的主观努力也可对历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如何认识与把握历史的“机运”,范曄认为,把“顺天”与“信人”结合起来,“舍诸天运,征乎人文”^②,就可以乘势而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为“欺天”之举:“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③

把握历史“机运”,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抓住历史发展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往往存在于人所忽略之处,所以需要有过人的眼光与远见。范曄在评价东汉初期邳彤辅佐光武帝成就大业的史事时说,他能够在多数人都认为当“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的时候,坚决反对众议,主张非常及时,可称得上是“一言可以兴邦”。这就是所谓的时势之“几”。而这种“几”即机会之所以很少被人了解与把握,就在于“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难昭。斯故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④。正是这种细致而微的历史机遇,及人们对待这种机遇的态度,往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历史人物的命运。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这种“几”更多地存在于“变通之世”。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范曄举邓禹之例说,他能够在光武起兵之时慧眼独具,“羸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后论。

②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后论。

③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后论。

④ 《后汉书》卷二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后论。



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这种对历史机会的把握,使他在东汉建立后,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褰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①。这种关于“变通之世”“君臣相择”的认识,不仅是对古代君臣关系的积极见解,而且将关于历史发展机运的探讨,扩展到了更为具体与深入的层面上。

二、宽厚为政与张弛之道

范晔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突出地反映在对于宽厚为政与张弛之道兼行的重视。

如前所述,儒家的“德治”思想是范晔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以“宽”、“仁”为执政原则,则是“德治”的重要表现。在《后汉书》中,范晔对宽厚为政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东汉诸帝中,他对章帝的“宽容”、“好儒术”、“天性恺悌”、“思服帝道”多次称道:

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国所

^① 以上见《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后论。



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①

传称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国者,必其子孙。
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
信哉!②

这里,范曄通过对明帝与章帝的比较,说明了他所认为的“宽厚为政”的具体表现,即“除惨狱之科”、“著胎养之令”、“尽心孝道”、“崇建周亲”、“平徭简赋”等等。总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汉章帝做到了这些,所以出现了“蕃辅克谐,群后德让”的和谐局面。范曄以章帝为“长者”,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为人的“宽厚”与为政的“宽厚”是相通的。而以古人“有吴国者,必其子孙”之说为“信”,则说明范曄是将“宽厚”作为从政的一个很高的标准来看待的。

为进一步说明宽厚为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范曄还从东汉之兴的角度,说明了“宽则得众”,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的道理:“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③通过考察两汉更替之际,诸多乱世“英雄”不能取代刘氏天下的史实,范曄认为,正是由于“刘氏之遗恩余烈”泽被后人,所

① 《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后论。

② 《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后论。

③ 《后汉书》卷一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后论。



以才使刘氏子孙“再受命”。由此可见,汉代自高祖、孝文帝时就施行的宽仁之政,“结于人心深矣”。事实上,范晔在这里阐明的是政治统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道理。但是,在他所强调的几个概念中,“得众心”而非宽仁之政,才是东汉再兴的根本原因。而“得众心”的前提,显然不仅仅是“宽仁”。尽管如此,范晔能够在当时提出“得众心”与“结于人心深”对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在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下层人们生活动荡的情况下,更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律法是用以维护统治、保持稳定的重要工具。范晔将“宽刑”亦作为“宽政”的重要内容看待。他认为,在政治统治的诸多要素中,总会有轻重先后之分。对于律法在这中间的位置,他这样论述道:

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贵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声,戒淫色,其有关雎之风乎!①

这里的“远业”,指的是德礼,“小数”则指具体的“名法”。而前者无疑具有更本质的地位。君子为政,当着眼于大且远者,无论因之得还是失,都可称得上是“得”。这反映了范晔对政治

① 《后汉书》卷二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后论。



统治的不同层次具有清晰的认识,以及他对儒家德治与礼治的重视。与之相应,为了达到“德治”的远大目标,就必须先礼后法,以“宽大”作为执法的基本原则。

基于这样的认识,范曄对东汉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的治国特点给予了高度评价。“(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正因为如此,建武、永平年间的政治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榜样,“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①。尽管如此,光武帝与明帝在执法过程中亦有不同程度的苛察之弊:

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笪豆之事则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长者之言哉!^②

所谓“贾生之论”,这里指贾谊针对有人告周勃谋反之事所论,他说:“廉耻礼节以绳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范曄关于律法的几点认识:一是执法者当为专事此职者,在上之人不应越俎代庖;二是执法不宜过严,尤其对于位高权重者更

① 《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后论。

② 《后汉书》卷三三《朱冯虞郑周列传》后论。



是如此,否则将流于“苛察欲速之弊”,这种弊端,用东汉朱浮的话说,就是“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貽后王也”^①。这就使得“刑理”失去了它存在的本意。

在《后汉书》中,范晔还举出不少相关史例来阐说自己的“宽政”主张。如《张王种陈列传》记载,南阳太守王畅以威猛治境,收效甚微。其后他纳功曹张敞“五教在宽”,“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之言,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类似这样的记载,除了反映东汉的客观历史之外,更多地体现了范晔关于“宽刑”的认识。

“宽刑”是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出的施法基本原则。至于这一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因素,他认为最重要者为“察情”。在《郭陈列传》中他提出,“察情”而后用“恕心”,天下正直庶几可得,施法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夫贤人君子断狱,其必主于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在根据“小大之狱”的表面情况断案的同时,执法者还应该探寻案情背后的因素,“察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以“恕心”断刑。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东汉刑律,范晔对东汉蔡邕的历史命运作了分析,认为他以感叹董卓之死“有动于色”遭难入狱,执政王允欲诛之,并以“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为

^① 《后汉书》卷三三《朱冯虞郑周列传》。



由拒绝他修汉史之求,是刑罚太过。因为“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董卓对蔡邕有知遇之恩,蔡邕对其死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如能体察到这一点,“尚或为之不举”,何况当时“国宪仓卒”,正是用人之时,王允没有将国家大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因其“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至于“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更是闻所未闻的断刑原因了^①。这些分析既包括了范曄对蔡邕的同情成分,又进一步体现出他对“施法察情”这一原则的关注。

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出发点强调宽厚为政,可以说是范曄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对政治统治过程中的张弛之道的认识与把握,是范曄政治思想中另一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具有更多的辩证色彩与理性特征,从而把范曄的政治思想提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

范曄对光武帝刘秀有很高的评价。他对讖纬之说多有批评,但惟独对刘秀,有“其王者受命,信有合乎”的感叹。这种感叹除了有着某种程度的关于天命的认识因素以外,更多地是对刘秀“沈几先物,深略纬文”的赞许: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徼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

^①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列传》后论。

